



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

治理机制

Nobel Economics Prize

TH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

[美] 奥利弗 E. 威廉姆森 (Oliver E. Williamson) 著
石烁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

治理机制

TH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

[美] 奥利弗 E. 威廉姆森 (Oliver E. Williamson) 著
石烁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治理机制 / (美) 威廉姆森 (Williamson, O. E.) 著 ; 石烁译 . —北京 : 机械工业出版社 , 2016.1

(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

书名原文 : Th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

ISBN 978-7-111-52745-9

I. 治… II. ①威… ②石… III. 经济学—研究 IV.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04690号

本书版权登记号 : 图字 : 01-2015-5595

Oliver E. Williamson. Th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

Copyright ©1996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hina Machine Pres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通过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地区) 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治理机制

出版发行 :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 : 100037)

责任编辑 : 施琳琳

责任校对 : 殷虹

印刷 :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 2016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170mm × 242mm 1/16

印张 : 27

书号 : ISBN 978-7-111-52745-9

定价 : 95.00 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客服热线 : (010) 68995261 88361066

投稿热线 : (010) 88379007

购书热线 : (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读者信箱 : hzjg@hzbook.com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本书法律顾问 :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韩光 / 邹晓东

丛书序一

厉以宁 北京大学教授

机械工业出版社经过长期的策划和细致的组织工作，推出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该丛书预计出版经济学获奖者的专著数十种，精选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代表性成果和最新成果，计划在三四年内面世。我以为这是国内经济学界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要知道，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学领域内名家辈出，学术方面的争论一直不断，许多观点令经济学者感到耳目一新。这既是一个怀疑和思想混乱的时期，也是一个不同的经济学说激烈交锋的时期，还是一个经济学家不断探索和在理论上寻找新的答案的时期。人们习惯了的经济生活和政府用惯了的经济政策及其效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学家普遍感到有必要探寻新路，提出新的解释，指明新的出路。经济学成为各种人文学科中最富有挑战性的领域。难怪不少刚刚步入这个领域的经济学界新人，或者感到困惑，或者感到迷茫，感到不知所措。怎样才能在经济这样莫测高深的海洋中摆对自己的位置，了解自己应当从何处入门，以便跟上时代的步伐。机械工业出版社推出的这套“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等于提供了一个台阶，也就是说，这等于告诉初学者，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各位经济学家是怎样针对经济学中的难题提出自己的学说和政策建议的，他们是如何思考、如何立论、如何探

寻新路的。这就能够给后来学习经济学的年轻人以启发。路总是有人探寻的，同一时期探寻新路的人很多，为什么他们有机会进入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呢？经济学重在思考、重在探索，这就是给后学者最大的鼓励、最重要的启示。

正如其他人文科学一样，经济学研究也必须深入实际，立足于实际。每一个新的经济观点的提出，每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形成，以及每一种新的研究和分析方法的倡导，都与实际有关。一个经济学家不可能脱离实际而在经济学方面有重大进展，因为经济学从来都是致用之学。这可能是经济学最大的特点。就以“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所选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著作为例，有哪一本不是来自经济的实践，不是为了对经济现象、经济演变和经济走向有进一步的说明而进行的分析、论证、推理？道理是很清楚的，脱离了经济的实际，这些分析、论证、推理全都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即经济学的验证经验是滞后的，甚至可以说，古往今来凡是经济学中一些有创见的论述，既在验证方向是滞后的，而在同时代涌现的众多看法中又是超前的。验证的滞后性，表明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研究思路也许要经过一段或短或长的时间间隔才能被变化后的形势和经济的走向所证实。观点或者论述的超前性，同样会被经济的实践所认可。有些论断虽然至今还没有被完全证实，但只要耐心等待，经济演变的趋势必然迟早会证明这些经济学中的假设——都会被人们接受和承认。回顾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经历和学术界对他们著作评价的变化，难道不正如此吗？

经济学同其他学科（不仅是人文学科，而且也包括自然学科）一样，实际上都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接力赛跑。后人是有幸的，为什么？因为有一代又一代前人已经在学科探索的道路上作了不少努力。后人总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即使前任在前进过程中有过疏漏，有过

判断的失误，那也不等于后人不能由此学习到有用的知识或得出有益的启示。

我相信，机械工业出版社隆重推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会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关注经济学的进展，促进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的深化，并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2014年9月21日

丛书序二

何 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 世纪，尤其是 20 世纪后半叶，是经济学家人才辈出的时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全称是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中央银行于其成立 300 周年的时候设立，并于 1969 年首次颁奖。这一奖项被视为经济学的最高奖。截至 2014 年，共有 75 名经济学家获奖。

我们当然不能仅仅以诺贝尔奖论英雄。有些经济学家英年早逝，未能等到获奖的机会。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授予一个领域的代表人物的，但有些领域热门，有些领域冷门，博弈论是发展最为迅猛的一个领域，研究博弈论的经济学家有很多高手，可惜不能都登上领奖台。有时候，诺贝尔奖的授奖决定会引起争议，比如 1974 年同时授给左派的缪尔达尔和右派的哈耶克，比如 2013 年同时授予观点相左的法玛和席勒。尽管同是得奖，得奖者的水平以及学术重要性仍存在较大的方差。但是，总体来看，可以说，这 75 位经济学家代表了 20 世纪经济学取得的重大进展。

经济学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经济学发展出了一套系统的分析框架，从基本的假设出发，采用严密的逻辑，推导出清晰的结论。受过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家会发现和同行的学术交流变得非常方便、高效，大家很快就能够知道观点的分歧在哪里，存在的问题是什么；经济学形成了一个分工细密、门类齐全的体系。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经济计量

学是经济学的旗舰，后面跟着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主力，以及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新兴或交叉学科；经济学提供了一套规范而标准化的训练，不管是在波士顿还是上海，是在巴黎还是莫斯科，甚至是在伊朗，学习经济学的学生使用的大体上是同样的教材，做的是同样的习题。从初级、中级到高级，经济学训练拾级而上，由易入难，由博转精；经济学还值得骄傲的是，它吸收了最优秀的人才，一流大学的经济系往往国际化程度最高，学生的素质也最高；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经济学成为一门显学，经济学家对经济政策有重大的影响，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里有经济学家，大众媒体上经常见到活跃的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经常会到经济学的殿堂里接受培训，然后回到自己的阵地传播经济学的火种。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指出，经济学发展到今天，遇到了很多“瓶颈”，创新的动力明显不足。经济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整齐划一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单调乏味。有很多人指责经济学滥用数学，这种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没有击中要害。经济学使用的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数学，即极值方法。消费者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他们在预算的约束下寻找效用的最大化。企业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它们在资源的约束下寻找利润的最大化。政府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它们在预算的约束下寻找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经济学的进步，无非是将极值方法从静态发展到动态，从单个个体的最大化发展到同时考虑多个个体的最大化（博弈论），从确定条件下的极值发展到不确定下的极值，等等。其他学科，比如物理学、生物学也大量地使用数学工具，但它们所用的数学工具多种多样，变化极快，唯独经济学使用的数学方法仍然停留在原地。

经济学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经济学家原本也是各执一词，争吵激烈，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还是要“和平共处”。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学不仅在研究方法上“统一”了，思

想上也要“统一”，经济学界对异端思想表现得格外敏感，如果你跟主流的思想不一致，很可能被边缘化，被发配到海角天涯，根本无法在经济学的“部落”里生存。这种力求“统一思想”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经济学的自我批判、自我更新。

经济学常常被批评为社会科学中的“帝国主义者”，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常会渗透到其他学科，更主要的是因为经济学和其他社会学科的交流并非双向而平等的，别的学科向经济学学习的多，而经济学向其他学科学习的少。经济学变得日益封闭和自满，讨论的问题“玄学”色彩越来越浓厚，往往是其他学科，甚至经济学的其他领域的学者都不知道讨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于是，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交流就更加少，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现实的挑战。20世纪中叶经济学的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战后重建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的回应。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引起了经济学的又一次革命。如今，我们正处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新阶段，经济增长前景不明，金融风险四处蛰伏，收入分配日益恶化，这些复杂的问题给经济学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经济学或将进入一个反思、变革的新阶段，有可能迎来一次新的“范式革命”，年轻一代学者将在锐意创新的过程中脱颖而出。

创新来自继承，也来自批判。机械工业出版社拟推出“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出版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的各类著作，其中既有精妙深奥的基础理论，又有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分析，还有一些是经济学家们对自己成长道路的回忆。有一些作者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有一些是过去大家了解不多，甚至已经淡忘的。这将是国内最为齐全的一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系列丛书，有助于我们对20世纪的经济学做出全面、深入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站在巨人的肩头，眺望21世纪经济学的雄伟殿堂。

2014年12月12日

推荐序

张 军 上海复旦大学

《治理机制》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的新制度经济学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它囊括了1983～1996年威廉姆森在交易成本经济学框架下对治理问题的全部研究成果。

在本书中，威廉姆森悉心构造“主要事例”（main case），并通过经济学、法学和组织学的跨学科视角，说明治理机制在缓释风险上的作用，由此推进比较经济组织分析，并用生动的案例展示了这一理论的适用性与解释力。

“主要事例”这一概念是威廉姆森在本书中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贡献所在。其核心是节省交易成本，这超越了早期制度经济学家诸如凡勃仑等人的理论摸索，也与随后西蒙所提出的“满意化”不同。“主要事例”脱胎于威廉姆森对于生产者决策的分析。生产者要么依赖合作来生产中间品或服务，要么向外部供应商购买。这类生产-购买决策决定了生产者采取兼并措施从而进行纵向一体化的程度。

除了节省交易成本这一核心要素，威廉姆森的“主要事例”还需要其他条件作为支撑。首先，在威廉姆森看来，交易成本存在性成立的前提条件是行为假设，也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有限理性假设源于西蒙，他认为人是“意欲理性的，但仅是有限如此”，这是因为人所掌握的信息总是不全面的，并且人的预见能力也总是有限的。进一步来讲，有限

理性的人如果希望实现自利就需要说谎和欺骗，这便构成了威廉姆森的机会主义假设。因为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的存在，交易合同虽然可以做到形式完整但实际内容却总不完备，而且执行还有困难。此类合同抬高了交易成本，这使得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同样不可忽略。

其次，威廉姆森利用资产专用性假设确立了交易成本的破坏性。威廉姆森认为资产专用性指的是一种具体化的投资，这类投资一旦改变用途或者使用者都会招致不可忽视的价值损失：合同双方必须唇齿相依，而且“唇亡必然齿寒”。这意味着一方如果毁约就会对另一方造成巨大的交易成本。为了缓释此类交易风险，合同双方必然竭力设计可信承诺。如若可信承诺无法确立，双方要么无法交易，要么兼并或者收购。而正是并购行为才催生企业去建立“治理结构”，而不同的治理结构（市场、层级制与混合制）基于不同的合同法系，在解决不同利益的协调问题时发挥着特有的作用。

在本书中，威廉姆森不但运用了经济学分析方法，而且还运用了法学和组织学的跨学科视角。关于法学，新制度经济学争论的焦点是，一方面认为企业内部的威权是“真实的”（Barnard, 1938；Coase, 1937；Simon, 1947），而另一方面认为企业不过是“合同的扭结点”，威权观在这里是被否认的（Alchian and Demsetz, 1972）。在本书中，威廉姆森认为，层级制所隐含的合同法是自我克制的法律。因此，虽然法庭照理会审理企业之间的交易中有关价格、交货、质量等方面的争端，但同样是这些法庭，却会拒绝受理一个企业内部部门间的相同争端。实际上，层级制本身就是它自己的终审法庭。企业能够发布命令来管理交易，而市场却不能，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自我克制的法律之故。这一点产生了普遍的比较制度后果。

在组织学上，威廉姆森认为，首先，交易成本经济学与组织学已经难舍难分。交易成本经济学已经（并且将继续）受到根源于组织理论的概

念和实证规律性的重大影响。其次，交易经济学的关键概念与组织理论家正在发生富有成效的联系。但是，最后，威廉姆森也承认，交易成本经济学与组织学仍然存在着“正常的紧张状态”。

独辟蹊径的研究风格让威廉姆森获得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信任是经济活动的基石，威廉姆森将信任分为算计性的信任、个人信任、制度的信任，并发现根本不存在信任，而是存在承诺的不同等级的可信性。在公司金融方面，威廉姆森运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反驳 Modigliani-Miller 定理，利用资产专用性来分析公司金融行为，并且认为债务和股权不仅仅是融资工具，也是治理工具。他还意识到，采用层级制的现代企业已经成为一种类似政府的治理结构。通过对美国著名反托拉斯案件 Matsushita 案、White 诉讼案与 Monfort 诉讼案的梳理，他认为美国最高法院、联邦贸易委员会与反托拉斯局也都没有充分考虑到策略性行为。

虽然威廉姆森反复强调自己与新古典主义的区别，但实质上还是借用了新古典主义的思想，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视为一个函数，通过最优配置其生产投入要素，实现利润最大化。由此，兼并和收购都是企业通过提高自身垄断程度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手段。而威廉姆森认为，节省（最小化）总成本才是“主要事例”，才是主要且正在广泛发生的事实。在利润最大化问题下，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竞争与垄断、效率与福利损失。而如果要减少成本，新制度经济学将企业视为一个治理结构。威廉姆森强调资产专用性、可信承诺和治理结构。虽然新古典主义也关注成本最小化问题，但是新古典的成本仅仅是生产成本，而交易成本经济学则看到了交易成本的存在。

作为一部学术专著，本书在专业性与通俗性上保持了平衡。对于所有想要进入交易成本经济学世界的读者而言，第 1 ~ 2 章是不可错过的，威廉姆森介绍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学说史，并结合求学经历讲述了自己与

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渊源。对于在新制度经济学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方面深入研究的读者而言，威廉姆森在第3章和第4章为纵向合并以及资产专用性所构建的模型，从而形成的新古典与交易成本经济学综合分析框架，正是本书的精华所在。同时，本书能够运用通俗的语言来描述经济机制运作的细微之处，本书第5~8章展示了大量实际案例，这对于那些对治理问题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而言不愧为一个福音。对交易成本经济学与组织理论之间关系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本书第9章和第10章。如果你是企业管理者与政策制定者，除了案例分析部分，你还可以从第11~13章中看到交易成本经济学在经济政策和改革中是如何运用的。最后的第14章，威廉姆森坦承交易成本经济学面临的争议，并对未来方向做了展望。

本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治理结构的生成发展过程与协调运作机制，并为人们对治理结构的利弊取舍做出更好判断。尽管1996年出版的本书对于日新月异的现代经济学而言，在研究方法与叙述上已经显得有些古朴，但是作为威廉姆森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我们还是应当看到本书以及制度经济学所开辟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与范式的独特魅力。^①

2015年10月18日于上海

① 本文参考文献如下：

1. A A Alchian, H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 pp. 777-795.
2. C I Barnard. 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 [M]. 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3. 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 Economica, 1937, 16, pp. 386-405.
4. H Simon.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M]. New York: Macmillan, 1947.
5. O E Williamso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6. O E Williamson. The Economics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M]. New York : Free Press, 1985.

致我的学生：

我们一直协心戮力，
在面对与解决复杂的经济组织问题之时，
你们耐心而又敏锐。

序 言

要说到从一个比较制度的观点对组织经济学进行研究，我的戮力尝试滥觞于拙作“*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 Market Failure Considerations*”（1971b）。我们都知道，比较制度学说以经济规划^①分析为主，并且着重研究契约过程的细节。而那篇文章所用的方法出乎意料地显示出了相当大的一般性，这引致了后续的一系列研究。再加上与其他相关文章的相得益彰，后日所知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才开始成形。

交易成本经济学研究上的罗马大道和通幽曲径既多且杂，而在这条研究的路上，我遇到过许许多多有趣且生动的旅行者。其中的许多人则是那些与处于重重伪装之下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不期而遇的学生，这些伪装正是组织理论、组织经济学、制度或官僚经济学。虽然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从一开始就成果斐然地联系到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构建上来，但还是有人成功地做到了。他们起初为此类“非标准分析”而灰心，不过其中的许多人随后发现，交易成本经济学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一剂有用的佐料，甚至是一整套框架。

① 即 economizing。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传统上，国内普遍将“economizing”翻译为“节省”。不过，考虑到在本书中威廉姆森还对 economizing 进行了数理分析，为保持前后译文一致，我们这里统一使用“经济规划”，以涵盖 economizing 的数理含义。——译者注

我发自肺腑地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也是其中一部分）是年轻人的经济学。不仅仅因为学生更易于接受这些理念，更因为新制度经济学需要将截然不同的全新知识纳入研究的考虑中来，而学生往往是达成这些条件的希望所在。

话虽如此，但我绝不是说那些业已功成名就的学者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就与这一理论毫不相干了。正如本文所述及的另文所言，事实上，新制度经济学或者说交易成本经济学得益于众多先行理论精彩绝伦的铺垫。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应运而生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见证了整个社会科学界对“制度”这一命题的研究兴趣的复兴。同样，交易成本经济学所关心的问题及其研究这些问题所用的方法都与经济学现行的问题和方法交相呼应。

我们可以将《治理机制》理解为一个交织着坏消息与好消息的故事。坏消息是：与以前相比，经济组织因数量众多的风险而变得尤其复杂，况且这些风险正逐步积累，在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的前提下，引致种种不确定性的组合。好消息是：其一，正因如此，对经济组织的研究就变得更为有意思了；其二，人们对于这些风险往往富有洞见力，并且在丰富制度以弥合风险方面表现得非常不错，甚至极具创造性，而这个事实也让好消息增色不少。平心而论，我们之所以观察类型如此之多的组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风险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存在，这使得人们必须为之设计、选定并（或者）甄别出看似雷同实则具有细微差别的治理结构。

以下同事与学生阅读并评议了本书所依据的各篇文章，我对他们谨致以诚挚的感谢：Erin Anderson、Masahiko Aoki、Kenneth Arrow、James Baron、Dennis Carlton、Glenn Carrol、Richard Craswell、Paul DiMaggio、Frank Easterbrook、Melvin Eisenberg、Albert Fishlow、Herbert Ginitis、Gillian Hadfield、Henry Hansmann、Bengt Holmstrom、Paul Joskow、Sanford Kadish、Benjamin Klein、David Kreps、David

Levine、James March、Scott Masten、Claude Menard、Richard Nelson、Dan Ostas、Matthew Rabin、Michael Riordan、Roberta Romano、David Sappington、Neil Smelser、Pablo Spiller、Richard Stewart、Lars Stole、Richard Swedberg、David Teece、Lester Telser、Jean Tirole、Birger Wernerfelt、Robert Willig 以及 Brian Wright。

我同样希望感谢洪堡基金会、Rudolf Richter 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中心[⊖]，感谢其慷慨资助使我得以完成德国萨尔布吕肯之行；感谢斯隆基金会对研讨会的资助，感谢在我停留耶鲁期间帮助我的研究生；感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管理、创新与组织研究所对研讨会以及其他事务的支持；感谢 Olin 基金会、Bradley 基金会对于伯克利分校研究生工作的资助；感谢政策研究所[⊖]和世界银行的研究支持。

最后，我将感谢之情留给两位女性，她们一直是我最为坚定忠实的支持者：我的妻子 Dolores 是我求索之路上的益友与良伴；我的秘书 Gwen Cheeseburg 以惊人的精力与热情深耕了我的手稿及不厌其多的修订稿。

感谢以上每一位，感谢你们。感谢我的学生，我把这本书献给你们。

O. E. W

加利福尼亚，伯克利

1995 年 3 月

⊖ 原文为 the Center for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译者注

⊖ 原文为 the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译者注